

抗战时期党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

合会通过《大众日报》向工人们发出呼吁：“前线需要我们！抗战需要我们！我们应当毫不犹豫的投身到民族革命的大浪潮中来，成为抗战的骨干力量。”

动员劳动群众发扬团结精神联合其他力量共同抗日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因此，在“五一”劳动节纪念中，动员劳动群众发扬团结精神，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五一”纪念中新的内容。1937年4月，党中央发布《关于今年五一节决定》，指出“应在广大群众中解释党的新政策”，这个新政策就是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国的政策，是为着对日抗战，对内民主，改善民生。全面抗战爆发后，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劳动群众团结抗战更是成为劳动节纪念的重点。193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就是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1940年，党中央再次就“五一”纪念工作作出指示，要求“使五一节成为工人阶级检阅和总结自己执行抗战任务和继续组织与发挥力量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的节日”。

1938年，延安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活动当天，会场上设有国共两党的旗帜。参加大会的人员有1万余人，男女老少、天南地北的人都来了，甚至有国外的记者和旅行家，出席人群彰显出鲜明的团结统一色彩。会场上各界群众高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展现了这年“五一”劳动节纪念的独特之处。1939年5月1日，延安举行了“延安各界精神总动员宣誓暨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与会人员达到3万人。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他说我们今天纪念“五一”不仅是工人阶级领导人民举行纪念，而且其意义还在于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反响，现场听众掌声雷动，高喊“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等口号。之后，大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群众情绪激昂，整个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才宣告结束。

引导劳动群众树立正确的劳动意识建设红色政权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红色政权下工人的劳动发生了质的变化。“五一”劳动节纪念也被赋予新的内涵，教育引导劳动群众树立正确的劳动意识，投身政权建设。

1934年，《全总执行局“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工作决定》提出，在苏维埃政权下要“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对待劳动，提高国家企业的生产与劳动纪律”。1942年“五一”劳动节，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克服困难向前迈进》的文章，指出我们纪念今年“五一”时，需要“教育工人们认清自己的事业和责任，用新的态度来参加劳动”。1943年，朱德在延安纪念“五一”大会上再次强调，边区工厂是工人们的家庭和事业，他们便是这一事业的主人，要在“工厂中认真进行抗战的革命的教育，培养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的新的道德观念”。

1934年，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苏区国家工厂举行了热烈的劳动竞赛，引导工人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参加竞赛的军委印刷厂、枪炮厂等工厂超出规定的生产量，产品质量也很好，不仅生产效率高，在原材料节省方面也很突出。卫生材料厂改进节省肥皂的方法，弹药厂则超出规定生产量的333%，被称赞是“空前未有的伟大成绩”。1941年，为了迎接“五一”劳动节，陕甘宁边区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生产大竞赛。在竞赛中，工人们你追我赶，相互比拼，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形成了浓厚的劳动氛围。4月25日，边区总工会举行了“五一”生产大竞赛总结大会，宣布各工厂平均生产量超出原计划的43.6%，其中最突出的是八路军制药厂，超出了120%，总结大会共选出了6家优胜集体和274名劳动模范。这些劳动模范又在边区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受到政府嘉奖。在生产竞赛的鼓舞下，广大劳动群众又喊出了“为完成1941年自给自足的经济计划而奋斗”。可以说，通过劳动竞赛和劳模表彰，广大劳动群众对在人民民主政权下的劳动有了正确的认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红色政权的经济建设。

“延安五老”身上的优良作风

□ 秦立海

学史明理

“延安五老”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革命老人的尊称，并一直沿用至今。“延安五老”之所以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正如毛泽东所言，主要不是因为人老可贵，而是因为精神可贵。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充分展现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

坚定不移、知行合一的理想信念

思想作风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和灵魂。“延安五老”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并在个人思想认识上经历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正是这种双重转变，使“延安五老”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特别执着和坚定，并为此奋斗终身、矢志不渝，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1921年入党的林伯渠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吴玉章就是“这样的人”，他曾结合个人经历回忆，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使其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后于1925年春入党。50岁的徐特立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这与当时不少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下脱党、退党甚至叛

党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坚定不移、知行合一的理想信念，是“延安五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推求后作出的郑重选择，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人民至上、勤政为民的公仆本色

“延安五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做“人民的勤务员”为荣。延安时期，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强调：“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为了解边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林伯渠经常拄着拐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走家串户，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成为群众心目中和蔼可亲的“林老头”。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教育子女将来“能做个好的人民勤务员”。他称自己做的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并表示“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董必武也对群众说：“我是当勤务员的，人民的勤务员嘛”，并对家人讲，做行政工作并不是做官，假使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吴玉章不但自己一生勤政为民，而且特别叮嘱担任县长的侄子要“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随时注意人民疾苦，使人民各得其所”。由此可见，“甘为民仆赴为官”是“延安五老”一生的生动写照。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传统

“延安五老”无论是在工作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都是全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典范。抗战时期，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要求工作人员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

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董必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才更换”，甚至曾为六角钱的伙食费对不上账而作检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的林伯渠“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下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艰苦朴素的形象跃然纸上。大生产运动期间，林伯渠带头开荒种地，并制定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谢觉哉1937年到兰州做统战工作时买了一双皮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有人提出建办公大楼，他却认为房子只要不塌、不漏就可以住人，维修一下就可以了。“延安五老”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全党学习的楷模。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

延安时期，林伯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工作十分繁忙，但边区政府开会，他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签到。有一次，办公厅党支部开会没有通知他，他却自我检讨并提出“不要取消我参加党日活动的资格”，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董必武不但严于律己、尽职尽责，而且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为此，他曾写“通函”告诉求其办事的亲友，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因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对于徐特立，毛泽东曾称赞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徐特立收到人大代表补助费，当即将钱退回，并让秘书回信解释道：“我每月有薪金，人民代表应该为人民办事，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以后不要再给我寄这笔补助费

了。”1958年吴玉章回到家乡蔡家堰，看到当地教育依然落后，就将自己的旧宅捐赠给当地政府办了一所师范学校。吴玉章还严格要求家人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由此可见，“延安五老”在工作和生活中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令人肃然起敬。

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精神

“延安五老”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全党学习楷模。谢觉哉强调，领导干部学习要“有的放矢”，即要“弄到箭——学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件事；看清靶——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是一件事；学会射——瞄准靶、手法稳——又是一件事”。唯有如此，才能“拿马列主义的箭，射中国革命诸问题的靶”。谢觉哉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堪称楷模。徐特立青年时期制定了一份“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不惜变卖家产购书学习，43岁时与青年学生一起赴法勤工俭学，51岁时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70岁时还在制订十年、二十年的学习计划，被谢觉哉誉为“我党全体同志学习与学问成功的旗帜”。吴玉章一生“马列为师范，门徒改学风”，不但自己坚持学习，而且教书育人，希望青年学生刻苦学习国家所需要的本领，在什么岗位上，就决心钻研什么，努力成为“德才兼备的人”。董必武一生都在践行“学习修身”“学习为民”的理念。他常对人讲：“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并把“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作为自己的学习信条。董必武晚年还在刻苦学习外语，并以身作则教育孩子“学要有恒，尤要专心”。“延安五老”皆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全党榜样，这种终身学习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仰。

陈日新：“干部不上前线，改革就是空谈”

□ 吕 品

陈日新（1932—2007年），曾任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山西省大同矿务局局长，朔州市政协主席。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陈日新“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中外合作“平朔模式”的创造者。陈日新受命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发建设中，积极探索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模式，为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合作创办企业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开拓者。

发扬“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亲自策划并直接促成我国的一个中外合作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该项目开“引进外资、引进装备、引进管理、引进技术”之先河，是中美双方“和衷共济、开发矿业”的友好开端，被称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在着手组织协调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时，时任大同矿务局局长的陈日新成为第一人选。他勇挑重担，立刻表态：“不用等明天，我愿意到平朔去！”

在前期安太堡露天煤矿建设中，对外谈判进展缓慢，由于合作合同未能及时签字，项目批不下来，一直不能贷款，导致许多工作无法开展。当时国内对引进外资开发煤矿还有着“办这号企业是姓‘社’还是姓‘资’”等议论，陈日新鼓励大家“平朔项目不会下马，因为党的开放政策不会改变，外国人真的不干，我们自己干，也非干成不可！”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陈日新积极争取，国家计委分两次批给平朔项目5000万元，突破贷款无门困境，露天煤矿的建设稳步推进。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露天

煤矿面临着来自体制上、思想上、管理上以及文化上的各方面挑战。陈日新顶住质疑与压力，推动又好又快建设平朔项目。陈日新首创“全面起步、总体推进”的建设理念，提出“两大块、六条线、五同步”战略决策，力求总体最佳速度。把工业区和生活区划成两大块，分铁路、公路、水路、电路、通信网路、征地拆迁和汉墓发掘六条战线；在工业区建设的同时开始生活区建设，矿山建设和铁路建设同时进行，配套工程同主体工程一起完成等。1987年，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安太堡煤矿建成，其从动工到投产仅用26个月，工期仅为国内同类项目的四分之一，开创了中外合作经营的“平朔模式”，为大规模引进外资、合作创办企业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坚守“以我为主、开放合作”的底线思维。在平朔露天煤矿建设初期，陈日新带领平朔人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精诚合作，创造出高效率、高科技、高效益、快节奏的“平朔模式”，彻底颠覆传统煤矿管理模式。他打破“大而全”的编制思维，将年产1533万吨的煤矿定员压缩至4500人，机关干部仅140人，而同等规模井工矿需8万人，效率提升近20倍。这一成就的背后，是他对“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彻底颠覆，积极推行用工制度改革，大量采用合同工，建立劳务公司与培训中心，成为全国煤矿现代化管理的典范。在此过程中，中方始终尊重外方管理权（如联合管理委员会机制），建立“双轨制”沟通机制，完成了中外合作治理机制的首创。一方面，通过引进一消化一创新，平朔用5年时间走完了西

方国家30年的技术跨越，推动中国露天采矿技术跻身国际第一梯队；另一方面，建立风险对冲机制，在合资合作期即预留“双轨制”预案，如设备采购合同中强制要求技术转让条款，为后续自主化铺路。

1991年，外资撤离安太堡露天煤矿。为克服中外合作企业“依附性风险”，陈日新在实践中推动技术自主化和管理的本土化。陈日新成立“配件国产化办公室”，自主研发关键设备配件，推动采矿设备维护本土化，破解“卡脖子”难题，3年内实现80%配件国产化，节约成本60%。例如，面对416台（套）超大型进口设备，他率队自主完成接运组装，节约2000万元费用，并培养146名技术骨干。在筛选工艺、采矿流程中逐步实现技术替代，减少对外依赖，保障生产连续性。他力排众议投资2.3亿元建设洗煤厂，将煤炭的硫分从2.4%降至0.8%，使平朔煤重新获得国际市场认可。

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的指导思想。在中外合作经营的特殊背景下，陈日新创造性地摸索出一套中外合资企业下党务工作的新方法，通过党建实现“合作不依附”的治理平衡，使安太堡露天煤矿从合作经营初期开始，始终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坚持“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实现平朔煤炭工业公司与合资公司合署办公，通过党建引领确保中方权益。例如，党委书记同时担任总经理，既参与外方主导的联合管理委员会、维护了合作框架，又在重大事项行使中方决策权。凭借工会组织在合作企业中的特殊地位，由党务干部兼任工会职务，使党的活动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紧密结合，和党员、群众的思想贴得

更紧。

外资撤离后，陈日新提出“党建强基、创新突围”的战略，将党组织转化为技术自主化和管理的核心引擎，推行“党委前置决策+经理层执行”的治理结构，将原联管会职能纳入党委常委会，重大决策需经党委全会审议。将党建要求嵌入“设备包机制”“成本倒逼法”“安全零容忍”等管理创新中。例如，党委将安全管理纳入“党员积分制”，党员因安全事故扣分直接影响晋升，使全员安全意识大幅提升，事故率较外资撤离时下降80%。

在合作企业的特殊环境中，陈日新作为党委书记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高度的政治担当和过硬的党性修养树立起党员干部的标杆，成为平朔人心中“行走的纪律准则”。在负责上亿元设备采购时，他制定“三不原则”：不单独见外商、不接受礼品、不搞私下宴请。这种铁腕作风使平朔在中外合作期间保持“零腐败”。在工作中陈日新处处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安太堡矿建设关键期，他常驻工地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外资撤离后的设备国产化攻坚阶段，他亲自带队拆解进口电铲，连续72小时不离车间，以实际行动诠释“干部不上前线，改革就是空谈”。在生活中，陈日新事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拒用公车私行，家人不得入住违建馆，保持节俭朴素的个人习惯，树立了“廉洁奉公、忠诚担当”的典范。

